

七七事变追忆

郭景兴 蒋亚娴 著

主 编

政协北京市丰台区文史资料委员会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雕塑园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七七事变追忆

郭燕兴 蒋亚娟 著

主
编

政协北京市丰台区文史资料委员会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雕塑园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于宏雷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吴海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七事变追忆/郭景兴 蒋亚娴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6

ISBN 978-7-01-006218-1

I. 七… II. ①郭…②蒋… III. 七·七事变(1937)-研究 IV. K265.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9807 号

七七事变追忆

QIQISHIBIAN ZHUIYI

郭景兴 蒋亚娴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

字数:238 千字 印数:0,001-8,000 册

ISBN 978-7-01-006218-1 定价:3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 为纪念七七事变七十周年，政协北京市丰台区第八届委员会主席初建华率领导班子成员视察卢沟桥、宛平城（右起赵仑副主席、鲍顺新常务副主席、初建华主席、胡燕副主席、于雪鹰副主席、周大春副主席）



▲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外景

► 位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内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碑，碑高15米，宽8米，厚6.6米。江泽民同志于1999年7月7日亲笔题写碑名

▼ 卢沟桥位于北京西南，因横跨卢沟河——即今天的永定河而得名，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在这里制造了“卢沟桥事变”（亦称“七七事变”），中国抗日军队在卢沟桥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





▲ 宛平城位于卢沟桥东，明崇祯十一年(1638 年)建，全城东西长 640 米，南北宽 320 米，总面积 20.8 万平方米，原名拱北城，是一座桥头堡，城垣建筑与北京类似。著名的七七事变就爆发于卢沟桥与宛平城

▼ 1986 年 10 月，原二十九军部分官兵及子女来到卢沟桥上，前面舞刀者为原二十九军三营炮兵排长杨云峰，他手里的大刀是七七事变时用过的





◆ 守卫在卢沟桥上的二十九军士兵



编 委 会

主 编	沈 强	胡 燕	孙 涛	
副 主 编	唐晓辉	李 新	李 一	王广华
编 委	郭景兴	蒋亚娴	段晓微	董化斌
	谢立升	王艳秋	沈 晔	许 翔
特约编委	王庆祥	解学诗		
执行编委	唐晓辉			

纪念卢沟桥抗战七十周年

咏《七七事变追忆》

国破河山寇入深
同仇敌忾万民心
卢沟桥洒英雄血
抗战开篇历史根

郑孝燮

二〇〇七年三月于北京

目 录

从妄图不战而取 到发动侵略战争	解学诗 (1)
一本正气长存的史书	张鸿铸 (11)

人 物 篇

卢沟桥战斗中的中方主要军政人员	(3)
王冷斋 (3) 吉星文 (19) 金振中 (34) 洪大中 (44)	
沈忠明 (62)	
与事变有关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将领	(66)
宋哲元 (66) 秦德纯 (68) 佟麟阁 (69) 冯治安 (71)	
张自忠 (73) 赵登禹 (74) 张克侠 (76) 何基沣 (77)	
张寿龄 (79) 过家芳 (81) 朱 军 (82)	
与事变有直接关系的日方人员	(85)
田代皖一郎 (85) 梅津美治郎 (86) 牟田口廉也 (86)	
森田彻 (87) 一木清直 (87) 志村菊次郎 (88)	

战 场 篇

丰台	(94)
大井村	(100)
卢沟桥 宛平城	(102)
迴龙庙	(108)
大枣园	(110)
五里店 大瓦窑 卢沟桥火车站	(112)

廊坊	(114)
团河	(117)
广安门	(119)
南苑	(121)

组 织 篇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九军的建立	(125)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九军南苑军训团	(128)
西北军、二十九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	(133)

大 事 记

1931 年 (145)	1932 年 (145)	1933 年 (145)	1934 年 (146)
1935 年 (146)	1936 年 (149)	1937 年 (151)	

附 录	(168)
卢沟桥事变回忆录	王冷斋 (168)
卢沟桥抗战纪事诗 (五十首)	王冷斋 (176)
王冷斋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词	(189)
佟麟阁将军殉国处调查报告 (节选)	刘苏 王兰顺 (191)
七七事变目击者座谈摘录	(196)
塘沽协定	(203)
何梅协定	(205)
秦土协定	(207)
冀察绥靖公署和冀察政务委员会	(209)
事变时中国二十九军战斗序列表	(214)
事变时日军战斗序列表 (一)	(215)
事变时日军战斗序列表 (二)	(216)

后记	(217)
----------	-------

从妄图不战而取 到发动侵略战争

——七七事变前后日军侵华态势

解学诗

值此七七事变70周年之际，我们十分高兴地祝贺郭景兴先生、蒋亚娴女士大作《七七事变追忆》的出版。该书披露了日本蓄意武装侵略中国和中国军民英勇抗击侵略者的大量罕见珍贵著述与文献，这是被誉为“守桥翁”的郭先生的贡献。郭先生大半生守护在中华民族抗战圣地——卢沟桥，锲而不舍地从事与七七事变有关的文物搜集和史实调查研究工作，参与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筹建工作。为供作郭先生、蒋女士大作内容的参考，这里主要就七七事变前后日本侵华政策，特别是日军的侵略行径和态势，扼要做些阐述。

—

日本根据其既定的大陆政策，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北之后，必然继续采取步骤侵占华北乃至全中国。事实上，他们对华北的侵略，早在九一八事变时就开始了。1931年11月，关东军大特务土肥原贤二跑到天津制造事变，施展的是双重谋略，即不仅仅拟将溥仪偷运出津，还要占领天津各要冲，破坏杨村铁桥，接应韩

复桀^①，酿成华北大暴动^②，妄图在占领东北的同时，消灭在华北的东北军，吃掉华北整块地盘。但由于土肥原预先准备失误，他所操纵的两伙匪徒中的一伙，即所谓“河北治安维持会”派的张壁、李际春等抢先发动，另一伙即杨元吉一派未及参加，再加上中国方面预有准备，有力回击，以致未能达到其预先所策划的结果，最终仅将溥仪偷运出津，送到东北。

到了1933年3月，关东军进攻热河时，终于跨越长城，把战火烧到华北，甚至逼近平津。关东军司令官在进攻开始时即声明：“如果华北政权对我军采取积极的实力行动时，则不能不引起战祸以至华北”，^③同时还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了“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的最后通牒。中国当时部署在长城线上的有华北军、东北军、中央军、义勇军，加上平津驻军共有20个师。然而，到了5月中旬，正当日军采取当年攻打旅顺的办法攻击密云时，中国军队却受命停止抵抗，开始撤退。5月31日，中方代表在日军提示文本的“塘沽协定”上签了字。中国军警从冀东22县撤出，从而使600万人口、8000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沦为日方可任意行动的扩大侵华的基地。^④

关东军之所以没有攻入平津而接受停战，主要是慑于英美干涉，也有兵力不足的问题。日本此后采取的侵华战略是：打击抗日军，胁迫国民政府妥协，建立亲日政权，不战而取华北。中国方面由于“塘沽协定”签订，国民政府再也无法重提“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而是在继续“剿共”的同时，对日采取绥靖政策。特别是1933年9月庐山会议后，汪精卫取代宋子文任外长，亲日派抬头。黄郛、殷同在华北也积极为执行“塘沽协定”而奔走。因而继大连、唐山会议之后，经过北平会议，从1933年11月到1934年春，伪满和华北之间先后实现了通车、通邮，乃至伪满在长城各口设立关卡。这就助长了日本推行以“华北自治”为名的分割蚕食政策。政策的直接推行者，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

① 1931年10月初，关东军策划利用山东韩复榘军攻击在华北的张学良东北军，为此拟售予韩步枪1万支。

② 片仓衷：《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其二）。见《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みすず书房，1965年，第258—261页。

③ 日本陆军省调查班：《热河讨伐经过概要》，第5—6页。

④ 关东军进攻华北时，还曾唆使张敬尧（安徽人，曾任张宗昌直鲁联军第二军军长）发动政变，制造亲日政权。结果因张于1933年5月7日在北平六国饭店被暗杀而归于失败。

留下的日本所谓中国驻屯军（军部在天津海光寺，故一般亦称其为天津军），关东军作为搭档，也参与各种行动。

1935年，日本将华北危机推至顶峰。同年1月，关东军首先制造了察东事件，关东军声称，察哈尔省沽源县所属之长梁一带应归属于伪满热河省丰宁县，故要求中国军队撤至长城以西，为此派出第七师团“讨伐队”和第十三旅团的全部，由热河向西推进。那里本来已无中国军，故关东军并未与中国军接战。可是，国民政府也还是做了妥协退让，竟与日方达成所谓“大滩口约”，据此中国的宋哲元军再也不得出现在那里^①。关东军的目的是打通多伦至沽源的交通线，占据西进要地，即实行所谓“多伦战略”。

中国的退让，反而换来侵略者的愈加嚣张。1935年5月，华北日本驻屯军出场，他们借口两名报社社长被杀和所谓孙永勤事件，向中国发难和要挟。天津《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和天津《振报》社社长白逾桓都是亲日分子，他们分别于5月2日和3日，在北洋饭店与自宅被暗杀。至于孙永勤，乃是奋战在长城线上的抗日英雄，1935年2月进入冀东遵化县境。日军把这些事凑在一起，向中国方面提出，无非是要挟中国的借口。1935年5月29日，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驻平武官高桥坦向北平军委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提出要求“清算蒋介石的二重政策”和由11项内容构成的通牒，内容包括：从华北撤出东北军、中央军、宪兵三团、国民党，严惩杀人者，解散排日团体，河北省府迁移，等等。高桥坦还表示“有必要采取自卫行动”。至于关东军，当然表态支持华北日军。中国国民政府本已软化，可日本政府竟决定借机“一举解决过去的一切悬案”。于是酒井于6月8日又以最后通牒形式提出，“将河北全省置于几乎与非武装区同样的状态”，并要求在6月10日前必须答复^②。值此关头，关东军迅速向山海关集结，实行武装讹诈。慑于日军威胁的南京国民政府决定，9日由汪精卫电告何应钦“全部答应日方要求”。10日下午何

^① 据满铁总务部资料课：《察哈尔事件概要》（综合情报10第8号，1935年6月1日）载，关东军特从伪都“新京”调3架重型轰炸机。据《国闻周报》（第12卷5期）载，因日军轰炸，东栅子、沽源一带自卫团和居民死亡40余人。关于《大滩口约》，1935年2月2日由北平军委分会公布。

^② 满铁总务部资料课：《日中事件的经过》，综合情报10号之号外，1935年6月21日。

应钦访高桥坦正式答复，此即后来的所谓何梅协定。当夜，中央军第二师和第二十五师即由北平南撤汉口。就这样，国民党的军政力量，继冀东之后，被排除出整个河北省。

日本吞噬的目标不单是河北省，而是全华北，所以他们继续在各地寻衅闹事，制造亲日政权。6月27日就制造了炮打北平城的丰台事件。此次又轮到关东军出场，大特务土肥原任幕后总指挥。他一手操纵黑龙会浪人牛込富太郎，一手唆使老牌汉奸白坚武^①，收买丰台铁甲车大队原石友三部下和分裂势力武装“正义军”成员段春泽，但因中国预有防范，由丰台开出的叛乱铁甲车，见永定门紧闭，胡乱打了几炮，便自行逃窜，以失败告终。

日本为了实现分裂中国的华北“特殊化”，以“自治”为名，网罗汉奸进行炮制亲日政权的活动。在日军频频制造事件，特别是迫使中国签署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的咄咄逼人情况下，稍有理性的政界人士都是不会轻易倒向侵略者的。但是日本侵华狂人急不可待。1935年9月24日，新任日本驻中国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原为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在日本记者团午餐会上，公然抛出震惊舆论的爆炸性声明，要求“华北五省联合自治”，为此而不惜诉诸武力。日本政府虽也感到意外，但未制止日军的“华北自治”阴谋。1935年10月3日，日本外务、陆军、海军三大臣达成的“谅解”，反倒借此要求中国对日亲善、承认伪满洲国和共同防共。^②

1935年10月20日，关东军的土肥原再次出场，伙同另一名大特务松室孝良又制造了香河暴动。在日本浪人和香河劣绅的操纵下，两千暴民以要求减税为名冲城，之后又有二十余名日本宪兵进城推波助澜，全城大乱。日本浪人和劣绅要求县长让出县城，由民众组成政府。香河暴动尚未平息，11月12日关东军再次更大规模地在山海关集结兵力^③。此次武力威胁是针对中国以英资为后盾、与英镑挂钩的币制改革的，但又不单是针

① 白坚武，原为吴佩孚的政务厅长，在日方指使下，为拼凑华北伪政权曾数次阴谋暗杀于学忠，并策动于的部下叛变。后来，在沈阳还成立了以分裂华北为目的的“正义社”和“正义军”。

②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第303—304页。

③ 关东军第一混成旅团。

对币制改革。日方宣称，香河暴动和币制改革都更加形成“华北自治运动”的“气氛”。如果说真有这种“气氛”，那也是日本侵略者人为制造出来的。例如，11月25日就有数百名流氓受日人唆使围攻在天津的河北省政府和公安局；而11月27日，天津日军竟公然发表公告：“华北顷近之运动，乃因民众要求自治问题，故中国当局如以武装镇压实属徒劳。”^①就在这种“气氛”下，受日人指使，汉奸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于11月25日出笼了，一个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将冀东22县作为辖区。此刻集结在山海关的关东军也开始后撤了。

国民政府再次退让。为迎合日方，国民政府于12月18日在撤销军委会北平分会的基础上，成立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置于一般行政区之外，实行自治性管辖。日本面对冀东、冀察两政权并立局面的形成，顺势调整其“华北自治”政策为：以冀东伪政权为筹码，迫使冀察政权迅速“亲日化”，“一俟冀察的自治大体稳定时，则尽快促使‘两个政权’合并”，^②并把“华北自治”扩大到华北五省，以实现其“华北国”的美梦^③。为使经济侵略和政治蚕食同步，军部还指使满铁开始从事“华北独立场合”的财经调查。特别是满铁受命组成大规模的“军嘱托班”，对需要紧急夺取的战争资源和利权，进行调查。当时华北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对满铁调查班赤裸裸地声称：“作为军方，虽然因人而方针有所不同，但我个人考虑，应尽量避免国际冲突，实行实际的渐进主义”，“所谓‘实际的’，主要意味着经济力的把握，但要靠以军刀为背景的威胁，使之提供利权便利”，“所谓渐进的，就是逐步造成南京政府威力所不及的地区，在不引进外国势力的前提下，将中国置于分立状态。”^④

① 天津《益世报》，1935年11月27日。前此，11月20日日本驻南京大使有吉面见蒋介石，要求中央政府不要镇压华北“自治运动”。

②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第322—323页。

③ 1936年1月13日的《第一次华北处理要纲》和1936年8月11日的《第二次华北处理要纲》，都规定“自治区域以华北五省为目标”。后者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写道：“避免帝国的目的被理解为否认中国在该地区的领土主权，或者培育脱离南京政权的独立国家，抑或是呈现为满洲国的延长。”

④ 满铁经济调查会干事：《酒井大佐谈话大要》，极秘，打字件。附有“阅后焚毁”的纸签。

但是，以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为标志，在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达到高潮的情势下，无论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还是投降派卖国企图，都难遂所愿。事实表明，日本的“华北自治”的蚕食政策，没有也不会得逞。冀察政权非但没有“亲日化”，反而“对日态度渐趋强硬”，尽管日本已将一批顾问打入政权^①；按满铁设计并由满铁全额出资的子公司——兴中公司具体操作的资源利权攫取活动，也收效甚微，尽管日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已与宋哲元达成了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谅解。事实上，日方的主要对手冀察政权首脑宋哲元，后来采取了完全回避的对策，直到七七事变。

二

日本帝国主义因其妄图不战而取的“华北自治”阴谋碰壁、破产后，开始向准备武装夺取华北乃至全中国的战争政策转变，这种转变，1936年即悄悄地进行了。

1936年对日本来说是重要年份。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此刻极欲摆脱受到遏制的华盛顿体制，同时又感到一旦冲破华盛顿会议以来形成的帝国主义列强格局，势必遭到国际反应，吉凶难卜。所以，他们大肆叫嚣“1935、1936年危机”，借以鼓吹扩大军备，同时也是为摆脱国内政治经济危机，而极力推行战争政策和天皇制法西斯化。这一年的日本历史在这方面有着非同寻常的记录。

在决策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推出的题为《国策的基准》的国策大纲，野心勃勃地提出：“帝国应确定的根本国策是，与外交国防相伴随，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进出发展。”^②联系同一天日本四相会议所推出的“帝国外交方针”

^① 关东军将伪满龙江省总务厅长永井四郎等8人，加上来自其他方面者，共十余人任为冀察顾问。他们策动冀察政权中的亲日派，诸如齐燮元、潘毓桂、张壁、陈觉生等人，从事挑拨、分化活动。

^②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第344页。“东亚大陆”的重点系笔者所加。